

主持人语

钱林森 周宁

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则日出而不穷。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项目启动四年，研究与关于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反思相伴，也经历了四年。最初是乐黛云、严绍 DANG 等先生关于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考，成为 2005 年 7 月南京会议的重要文献，3 年以后才发表在《跨文化对话》上。钱林森与周宁先生关于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对话，分别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对话》，对该研究领域与该项目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2008 年发表在《跨文化对话》24 期的相关笔谈，已经明显表现出学理上的深入。但思考与批判远未结束，当叶隽先生在这组笔谈中率先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合法性提出谦逊的质疑时，所有的问题又都出现了。

立言者贵在立异。当叶隽先生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或者范式难以成立的论断时，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理基础就必须重新检讨。叶隽先生认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实质上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双边文学关系研究。他从三个方面思考“双边文学关系”的研究范式问题：一是比较文学的整体学术史意识、二是比较文学的思想史高度、三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文史根基”与方寸。叶隽先生温和的思考掩饰不住大胆的怀疑，关于目前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说法”与“做法”，似乎都有可商榷之处。宋炳辉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主体立场及方法的思考深刻而细致，“中外文学交流的双向接受与精神实质”这一提法是他立论的基点，由此他辨析“文学交流”与“文学关系”这两个概念，引发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观念、立场和方法问题的反思。“文学交流”以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实为关注的核心对象，“文学关系”则以此为前提，又纳入了关系主体的理解和阐释。“交流史”倾向于交往史实的发掘勾勒；“关系史”则更可以也更应该在此基础上体现对交往史实的评价。而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实践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仅其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和建构过程，其研究本身也应该是研究主体借以参与当代多元文化和文学建构的实践展开。

学科的基本观念与方法的辨析，既有思辩的层面，也有实证的层面。王向远先生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方法的重要性。目前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可以分为“点、线、面”三种类型。“点”研究具体个案问题的研究，重在

材料发掘与微观分析，追求的“深度模式”；“线”研究多个案在纵向时序链条上的关联性，重在历史性的系统梳理，追求的“长度模式”；“面”就是空间性的、横向的关系研究，重在理论性的概括与总体把握，追求的是“高度模式”。三种类型互为依存，相辅相成。而“点”的研究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遗憾我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上，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最为薄弱，问题也最大。王先生建议将“语义学”的方法加以扩展与改造，发展到“比较语义学”，将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即可以发挥中国学者的天然优势与丰富资源，又可以弥补当下研究方法的不足。具体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既“移语研究”与“译语研究”。王晓平先生有关“文学交流史中翻译之位相”的讨论或许属于深度的点的研究。文章本身就是一篇专题论文。王先生指出，文化亲历和翻译活动是文学交流研究者的两门必修课。而“文学交流史研究关注的是不同文学相遇时的交叉、交锋、交融等多方面的现象，翻译就成为其中首先值得着重探讨的领域。小则一个术语的翻译，大到世界性翻译浪潮的动向，都有许多有趣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思考。”

正如王向远先生指出，“比较文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很前沿的学科。它的前沿性主要应该体现于它的理论创新上的探索性、学术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学术方法的多样性与新颖性。”范劭先生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实证主义方法，其缜密深刻的理论思维发人深省。在范劭先生看来，理论是一种亦虚亦实的“仿像”。新实证主义把文学事实亦看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内亦外的中间状态（后现代的“既是……又是”、“中间空间”不过是对生活本身的隐喻），所针对的既非纯粹历史事实（对单纯的事实无话可说），亦不是纯粹思想形态（思想只存在于思想史而非生活中）。理论的第一参照系实为语言，一切事实均为发生于语言介质中的事实，语言要素“构成”社会现实，于是后者在描写/叙述的意义上成了第二维度——第一维度的事实是描写/叙述，即语言本身。由此前提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涉及到三个关键概念：话语事实、分层、具体的结构性。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仔细解释。范劭先生的思考本身就是元批评意义上的。他认为新实证主义的核心原则可归结为三点：1、理性和想像须臾不可分，故新实证主义既是实证，又是想像；2、理性的效能有限，故新实证追求局部的结构性。既是认知活动，就应严格限制在可行范围内，限制在对于自己的建构手段确有把握的程度内，这意味着：清醒意识到主体立场和目标的永恒距离；3、理性是多元而非普遍惟一的，故新实证主义强调在符号学基础上的价值与方法论多元化。

季进先生结合自己多年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心得，提出三

点问题：一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立足点的问题、二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史料学问题、三是中外文学关系评析中的复杂性问题。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每一种文学都需要在与其他文学的正常交流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审美个性。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来临，随着全球化经济、信息技术、跨国资本、大众媒介的介入，我们面临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相对主义时代，每一种文学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更加无法超越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自拉自唱，外国文学与文化对中国文学来说，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他者。我们必须在与他者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中共同发展，形成和而不同、协调共生的众声喧哗的格局。

王宁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向世界。他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中国既然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但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声音如此微弱？这究竟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仍在作祟呢，还是我们自身的水平确实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两方面原因都存在的话，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进而产生广泛的国际性影响？既然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因此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且更应当在包括世界文化和文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建树。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具有自己的学科优势，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先行一步。王宁先生明确指出，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应该是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打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内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使得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大大地提升，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张西平先生与王宁先生一样，学术视野开阔，思考从大处着眼。张先生认为，如果继续深入展开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是这种文学关系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整个研究的展开犹如空中楼阁；二是跨文化理论的构建。如何构建一种全新的跨文化理论和话语系统，解释文化之间的接受、变异，这是摆在丛书撰写者面前的大问题。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中国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和学术遗产，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梳理、研究，就可以走出我们现在那种凡讲理论全是西方的，在研究的基本理论上无根基、无特点的局面。